

偶然看到一段视频：小提琴家苏菲·穆特利用云技术，与伦敦爱乐乐团另外三位乐手共同演奏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穆特身着缩衣，口戴蓝色口罩，在家中深情演奏，舒缓的乐曲声中透着坚毅和温暖，给人以力量、温暖与慰藉。演奏结束，已被检测新冠病毒阳性的她，呼吁民众要保持社交距离，养成勤洗手和佩戴口罩习惯，并且用贝多芬的一句格言鼓励爱乐者：“通过黑暗，走向光明。”

犹记2008年采访苏菲·穆特时，正值汶川大地震。穆特闻知噩耗，毅然决定将上海音乐会部分收入捐赠给国际红十字会，以此购买帐篷和药品，火速运往灾区。同时，临时调整音乐会曲目，以巴赫《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和维瓦尔第《四季》作为主打曲目。最后，又加演一首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为受难人民祈祷，“为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以及

失去父母的孩子送去抚慰。我可以想象生命中最亲之人离去是多么痛苦和煎熬。

我的心与这些身处苦难中的人们同在。此时此刻，语言不足以表达情感，唯有音乐方能滋润干涸的心田。”

言谈间，穆特脸上挂着些许疲惫与惆怅。在她看来，音乐虽非万能灵药，但的确可以滋养身心，就像歌德对《G弦上的咏叹调》的评价：“《G弦上的咏叹调》，就如同永恒的和谐自身的对话，就如同上帝创造世界之前，思想在心中流动，就好像没有了耳，更没有了眼，没有了其他器官，而且我不需要用它们，因为我的内心有一股律动，源源不断。”

其实，穆特自己也经历过失去至亲的痛苦。1995年，仅仅结婚五年之后，丈夫温德里希便因癌症离她而去，留下一双未成年儿女。穆特跌入深渊，

琴弦上的咏叹

曹可凡

但她并未被击垮，而是靠音乐走出泥淖。在纪念亡夫音乐会上，穆特坦言：“你生命中的每一个悲剧，或者每一次精彩，都会改变你。我因此变成一个更敏感，更有感情，更细腻，对生命感恩的人。”所以，那天晚上演奏《G弦上的咏叹调》时，穆特执弓在琴弦上咏叹，那低徊深沉的旋律里流泄出一种哀而不伤的隐忍和恬静，仿佛诗人在吟唱，思想家在冥想，意境开阔、深沉，犹如罗马万神殿上照下的那一束光，激励人们从苦难中站立起来！

穆特与帕尔曼是古典小提琴领域的双子星座。作为男性演奏家，帕尔曼的演奏细腻委婉、悠远苍茫，有股子阴柔之美；而穆特美貌与才华兼具，演奏风格热情饱满，泼辣豪迈，有阳刚之美，甚至，还略显几分“傲慢”。但穆特表示这或许是某种“误解”所致，其实她生活中是十足有趣之人，只是走上舞台时便心无旁骛地投注于音乐之中，借此传达心声与灵魂。“这或许让人觉得有些严肃，但是，如果你闭上眼睛，更可感受到灵魂的倾诉。”穆特说。作为演奏家，穆特每次上台，总是着力在理智与激情之间寻找最佳平衡。她认为：“音乐会并非斗争，相反，是一种情感上的平衡。这种情感关乎究竟是机械重现作品，抑或是赋予作品以新的生命，因为音乐从来不是只有单一的表达路径。

当然，演奏家必须用大脑的理性支撑作品结构，然后通过演奏来重建结构，这就如同建造一所房子，仅有装饰远远不够，而是需要有一个基本框架。这大概可以看成心与脑的搏击与和谐。”至于何为演奏最高境界，穆特的解读是，只有沉醉于音乐的流动中，达到天、地、人的高度和谐统一，才是所谓演奏的最高境界。不过要臻于如此完美境界，除了专注与无比谦逊的态度，惟有勤勉一条路径，且必须二十四小时均处于状态之中，不可有丝毫松懈。

穆特对音乐的见解固然有其天赋的成分，但也与恩师卡拉扬长期调教不无关系。对她而言，卡拉扬既是严师，又是慈父，有刻板认真的一面，也有轻松随和的一面。“与卡拉扬在一起演出，使我的音乐悟性大为提升。大师手下所发出的乐声是其他地方无法找到的。虽然他从未实际指导我演奏技巧，却让我体会到音乐的呼吸气息。”穆特感叹道。除音乐外，穆特发现卡拉扬对科学技术痴迷不已。当上世纪八十年代唱片格式从LP改到CD时，这位音乐大师都积极倡导。故而穆特戏言：“如果在今天，他一定喜欢网上购物，下载高品质古典音乐，就像我们今天用itunes一样。”卡拉扬是个梦幻主义者，毕生都在追逐梦想，对科技的崇尚与对音乐的膜拜，有着相同的高标准。这就好比贝多芬，他早期创作的钢琴奏鸣曲，其实是为

未来的一种乐器而写作。追求完美是音乐家的本性。“卡拉扬常说他总是在指挥两个乐团，一个是现实中的，一个是想象里的。这给我上了一课，那就是我们虽然生活在现实中，但头脑里却应该有个更高的目标，渴望终有一天，梦想成真，达成所愿。那是我们总想抵达的彼岸，一种无法言说的境界。”

不能否认，无论舞台上还是生活中，穆特周身均散发着迷人气质。她是音乐世界的骄傲，也是时尚领域的宠儿。既可以一边奏出莫扎特、维瓦尔第明媚悦耳的旋律，也可以展现小提琴与女性之间微妙的美感关联，其座右铭为“在一粒沙中看世界，在一朵花里观天空，将无止境握在手中，而永恒就在一瞬间”。

走笔至此，耳边响起维瓦尔第《四季·冬》的音乐，忽然想到珍藏的一张穆特与卡拉扬以及维也纳爱乐共同录制的维瓦尔第《四季》唱片。封面上，身着黑色抹胸礼服的穆特坐在森林之中，前面搁着心爱的小提琴，左肩披着一条猩红色围巾，沐浴着冬日的阳光；而唱片背面，卡拉扬则站立于林间，肩头围着同一条围巾。据说拍摄照片时，正值冬日，寒气袭人，穆特冻得瑟瑟发抖，卡拉扬见状立刻将自己的围巾将穆特包裹起来。摄影师灵机一动成就了这两张意味深长的照片。

如今，穆特已奇迹般地康复。相信她必定会以自己的经历给更多人带去勇气和力量。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

清茶

吕晓滨

封在武汉家中的七十多天，一直喝茶。因为据说茶有预防作用。不管是谣是真，反正茶总是要喝的，所以一直坚持，没有中断。而且要泡醒茶，大口喝，似乎不这样就达不到预防的效果。还别说，偶尔咽痛咳嗽，微觉不适，吞几口热茶真就好了，立竿见影，免除了疑病的惴惴不安，当然多半是心理作用。

一直喝的陈皮普洱，茶味纯正，带一点淡淡橘香，正合草药的调理治疗之意，心理抚慰效果更佳。六十天左右时喝完，换滇红，也不错。渐渐春深，忽然收到远方递来的绿茶，是三月间新采制的春茶。欣然沏上，抿一口，这就喝到了春天的一股清气。

清茶。我想大概只有春天的新鲜绿茶才能够叫清茶吧。陈皮普洱和滇红，在电炉上煮过，看上去像一杯红酒，有黏度，细腻幼滑，具浆汁感，浓香满口。不像清明前茶，放再多茶叶，沏出来也是一杯子嫩绿鹅黄。哪怕喝一口苦得不行，看上去也清淡。

喝上新茶，眼前这场泼天灾祸就该揭过去了，是也不是，反正我这样想。

最后的桃花

安武林

这株桃树没有坚实的主根，只有几个像手指头那么细的须根支撑着整棵树。也难怪，摇晃几下，树就被折断了。

人们之所以讴歌树根，不是没有道理的。一棵树，无论长得多么粗，长得多么高，花朵开得多么美，如果树根扎得不牢固，那么一定会在中途夭折，在不该夭折的时候夭折。

道理我明白，人人都明白，但我还是止不住忧伤。

一树盛开的桃花横卧着，像是在和人世告别，和这个世界告别。虽然含笑，但依依不舍的悲戚难以掩饰。

太阳，似乎正在念着长长的、长长的悼词。风吹过，沙沙的声音像是小小的哽咽……

据说年老的标志之一就是“觉少”，春日里天光早亮，六点起床就成了最近的习惯。早起其实无事。疫情还没完结，口罩下的圆脸便省下了拾掇的麻烦，不收拾人，那就收拾屋子。面南的房间是整面墙的落地玻璃。窗帘垂到地板上面半厘米。晴天时，阳光透过窗帘缝贴着地板照进屋里，我拿着抹布看地板上薄薄一层阳光里的细碎灰尘。

因为近视的关系，我喜欢蹲跪着用抹布慢慢地擦，但首先我得扫视一遍屋子里的所有角落。这样的视线总是会让我的脑子里跳出那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据说张大春在谈论修辞时曾举此例，说若是小学生写这样的句子，必然会被老师判一个“文句欠简练”，可他也说：若是简练

地修剪下来，我们就无法体贴那种站在后园里缓慢转移目光、逐一审视两株枣树的况味。差不多？先生看枣树，我看灰尘。

打扫也是一桩欠简练的事。宝爷常埋怨我天天擦地却总共也搞不出多少细碎，远不如攒上几天一次扫清来得痛快。我耐心与他解说：攒几日灰尘固然收拾得快意，可那攒的几日心里眼里

的不舒爽积起来也甚烦人，所谓长痛不如短痛，在这里可作此解。

擦地是一种爱好，整理东西是另一种。之前的超长假里，用各种箱、筐、柜整理了宝爷的各种书、卷、本，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翻到几篇宝爷的作文（从高中

起他就禁了我看他作文的权限）。只是翻到的那两篇，读得我颇为辛苦。于是整理书房时便“借整理喻文”地跟他探讨：文以载道，说理沟通，总是要让人容易看懂，就跟整理东西一样须得简单清晰，一眼就明白。

哪知宝爷一边穷经皓首地写作业一边甩出一句：不过是多写几个字，你不妨这么认为吧，我的文，载的是“勤为径”的道。

打扫整理都是外婆妈妈一脉相传下来的习惯，没有谁认真教，看多了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对于宝爷我估计指望不上言传，唯有努力在他周边转悠以期身教。他被我转悠得眼晕了就反过来苦口婆心地言传：“我所有的讲义就这

目前为我所在的中国海洋大学的研究生们做了一次通识教育视频讲座，顺便讲起看书和看手机的关系。想到这点和大多数人也可能有关，就请允许我在此照录如下。

记得我校文圣常院士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我们生下来就享受着李白杜甫等民族先贤留下的床前明月光等文化恩泽，因此我们有义务给后人留下一点儿什么。这样才是公平的，也才能保持文化传统不至于中断。平庸如我，固然没有文院士那样的境界，但至少晓得他说的是对的。如果我们不留一点儿具有文化意义上的什么，只留下一大堆形形色色的电脑手机或机器人，留下一大片五花八门的钢筋混凝土房子，留下一大排栉比鳞次的中外银行，那好意思吗？那有何脸面去见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他们？

总之，我们必须留下点儿什么。只有留下点儿什么，自己本身也才能留下。一位日本教授告诉我，世界上的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可能留下来的，一类是可能留不下来的。我知道他指的是一林少华个人是不是有存世之作。作为我，存世之作诚然不敢奢望，但留下一点儿涂鸦性文字总还是可以争取做到的。例如前不久我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发表了一篇关于洱海的游记，后人看了，至少可以从中想象洱海当年是那个样子的，它曾在每一个男人心中激起了那样的感觉。

何况，中国是个不屈不挠留下二十四史（世界绝无仅有！）的以字立国、以文史词章称雄于世的国家。说绝对些，没有记录、没有文字记录，就等于什么也没有，等于无，等于零，等于什么也没发生。不过我这把年纪，留下什么也好，不留下什么也好，其实都不重要了。一切取决于年轻人，各位年轻人一定要在文化上，进而言之，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点儿什么，这样也才能上无愧于先人，下无愧于后人。

而要这样，就一定要勤奋，做到“一日不可虚度”。当务之急，就要先把手机放一放。哦，不对不对，放下手机，正对着手机做视频讲座的我就讲不成了，你们不少人怕也看不成听不成了。乖乖，你说事情怎么成了这样？世界怎么成了这样？好，手机千万不要放下，或者等我讲完才放下。手机这玩艺儿，实在是太讨好我们了，讨好我们的眼球，讨好我们的欲望，讨好我们的心思。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我们把时间花在它身上，独霸我们的时间，谋杀我们的时间。当然不是说看手机纯属虚度。收获总还是有的。常言说开卷有益，“开机”也未必无益。但另一方面，看手机肯定看不出学位，看不出学者，看不出工程师，看不出科学家。

或许你要说“林老师，我正在用手机看《资本论》看《二十四史》而且快看完了哟！”果真？也许。毕竟这世界上存在所有特例和可能性。

不过，一般情况下我想给你的忠告是，在大家都齐刷刷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最好你一个人坐在某个角落里静静地看书——那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美学场景啊！如果你是男生，笃定有不止一个女生向你投去别有意味的视线。如果你是女生，起码有两个男生设法引起你的注意。不瞒你说，前不久在飞往大理的飞机上，几乎所有乘客都闷头看手机或张着嘴打瞌睡，而我斜对过的一位女孩始终一动不动地看书。那专注的神情，就好像“全世界所有的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加之正好有夕阳的光线从椭圆形的机舱窗口斜射进来而且正好射在她奶黄色的毛衣和秀气的脸庞上，使得她的半身剪影显得那么柔和那么优雅那么美丽。假如时光倒流半个世纪，我肯定厚着脸皮伸长脖子搭讪，问她看的什么书。假如好看的是我翻译的《挪威的森林》或者我自己写的《小孤独》什么的，往下的发展，真有可能一个是渡边君一个是小林绿子了。然而现实是，想象很美好，时间很残酷，休说倒流半个世纪，倒流半个小时都纯属痴心妄想。

恕我老调重弹，开卷，还是“开机”？这是个问题。

样堆着，要用什么就拿出来放在最上面，到最后所有有用的就都会在上面，最后只要把下面的那一半扔了就行了。这叫自然选择。”

这个春天，除了打扫和整理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话题。不同的文化必然会有不同的卫生防疫习惯产生，甚至于在同一文化里的不同时代，习惯也不尽相同。有人说判断一个人的文学修养，可以看他是否能背得出朱自清先生的《春》，按这个说法，是否背得出“两棵枣树”肯定也是一个标准。如果我们是在讨论文化，那标准就可以很多样。

十日谈

爱美的人肯定也是爱干净的，明刊《随手的活儿随手干》。责编：徐婉青

开卷有益还是“开机”有益？